



希伯来圣经之 十诫研究

Study on the Decalogue of the Hebrew Bible

田海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希伯来圣经之 十诫研究

Study on the Decalogue of the Hebrew Bible

田海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田海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0777-6

I. ①希… II. ①田… III. ①圣经-研究 IV. 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1592 号

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

XIBOLAI SHENGJING ZHI SHIJIE YANJIU

田海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10777-6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20 世纪以来,希伯来圣经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范式转移——由《圣经》至上的神学/教义范式和以《圣经》的字义研究为中心的文学批判范式,转移到以历史批判研究为中心,及至 20 世纪末的后现代之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以读者处境为中心的诠释学研究。遗憾的是,中国的希伯来圣经研究并未能充分地加入到这一场范式转移中去。田海华博士的新著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希伯来圣经研究融入世界学术潮流的希望与可行性。

希伯来圣经是以色列的信仰群体在特定历史及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在研究希伯来圣经的过程中,仅仅局限于对文本本身的探索,或是教会及信仰群体进行的教义式的解读,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时刻意识到,《圣经》也是在其一定的历史和文化的条件下完成的,是对这些历史条件的回应。那么,将经文置入历史的处境中重新思考,也应同样成为圣经研究的重点。而除了文本和历史处境之外,圣经研究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读者。当基督教来到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圣经》被译介于国人的时候,圣经诠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就已经开启。“十诫”作为教理问答文献的重要内容,便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近代圣经学者已经关注到历史上“十诫”文本在中国伦理框架中的多次诠释,田海华博士更跨进一步,对“十诫”文本与中国多元经典和文本的历史处境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辨析。景教传入中国之后,传教士们因应中国封建王朝的形势,把基督教传统的不可有二神,转换成崇拜基督与尊敬天子并行不悖。作者在分析这一历史处境时,带出“十诫”文本的中国处境化诠释,论述清晰而具有说服力。本书还展现了 16、17 世纪天主教来华时,如何结合“十诫”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教育皈依的中国教徒,将从而对“十诫”进行了新的诠释与界定。作

者又基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对“十诫”进行了女性主义的阅读,显示了其中蕴涵的性别与权力之关系。诠释“十诫”文本在何处尊重女性,又在什么地方损害了女性尊严。本书尝试着回答一个中国学者在面对“十诫”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处境与性别身份,是否影响了学者对于《圣经》的阅读与诠释?

近年来亚洲的圣经研究学者常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亚洲圣经研究仅仅是西方研究方法的重述吗?如何将西方研究方法运用到亚洲处境?如何描述西方文本在东方处境中的生存与变异?中国处境能为圣经研究贡献什么?在圣经研究这样一个浓厚的西方学术传统中,中国学者的立足点何在?本书恰恰为回答这些疑问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方向。作者的中国女性学者身份时时流露于全书的论述中,然而这种流露并非一种表象的感情表露,作者用心良苦地将这种身份关怀转化为独特的圣经诠释角度,不断地追问“十诫”文本在中国处境下的阅读可能性,从而实现了西方希伯来经典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女性解读。本书在亚洲妇女圣经诠释方面,实有开辟之功。

本书的学术贡献还在于整合和梳理西方圣经学术传统。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显学的希伯来圣经研究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本学、版本学、考古学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从读者角度诠释《圣经》的研究进路,更是开启了西方文本研究的一条新路。而圣经诠释学恰恰是中国圣经研究者着力最浅之处,就笔者目光所及,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圣经诠释学尚未有学术史的研究总结与归纳。本书导论部分对于西方圣经诠释学的爬梳与整理,必定有助于中国学界加深对这一西方学术传统的了解与运用。正是在此文献和方法论基础上,本书吸收了20世纪以来西方圣经诠释学的精华,将传统文本放置回到中国处境、读者处境以及作者的性别关怀中去,在历史、文本、读者这三个维度中,凸显圣经文本的复杂性。

本书以其无可辩驳的学术成就证明亚洲圣经处境诠释学这一研究进路是成功的。这只是一个亚洲圣经研究的开始,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共襄此举,开拓亚洲圣经研究的新世界。

李炽昌

2007年春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序	李炽昌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十诫研究历史的回顾	4
一、莫文克:十诫起源于礼仪	7
二、尼尔森:十诫的传统历史	17
三、菲利普斯:十诫是古代以色列的刑法	25
四、哈瑞尔森:十诫与人权	31
五、西宛:十诫的女性主义诠释	43
六、小结	52
第二节 十诫的独特性及其在古代以色列宗教中的地位	54
一、十诫的文本	56
二、十诫与耶和华—以色列人之约	61
三、十诫与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崇拜	64
四、十诫与古代以色列宗教的历史演进	69
五、小结	73
第二章 十诫的文学与文化语境分析	74
第一节 十诫在希伯来圣经中的文学语境及其传统历史	74
一、十诫叙述的文学语境	75
二、十诫的两个版本及二者的差异	80
三、十诫的划分与解释	86

四、十诫的文本结构	100
五、十诫的来源与形式批判	106
六、小结	115
第二节 十诫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法典之关系与比较	116
一、法的形式与结构	120
二、法的内容	125
三、小结	131
第三节 十诫与约:以色列与耶和华之关系的建立与维系	134
一、约的产生及其在古代西亚处境中的表现形式	135
二、约在希伯来圣经中的表达及其与宗主盟约之关系	147
三、约与十诫的整合	155
四、小结	169
第三章 中国语境下的十诫	172
第一节 唐代景教之“十愿”	173
第二节 明清耶稣会士对十诫的译述	180
第三节 耶稣会士与儒生天主教徒对十诫的诠释	190
第四节 儒家一神论	201
一、杨廷筠:奉天主则百神皆在其中	205
二、李九标:天主生神之意	209
三、严谟:天主造成天地神人物之序	212
第五节 反对纳妾	218
第六节 基督新教的诠释	229
第七节 小结	247
第四章 性别与权力:十诫的女性主义阅读	248
第一节 圣经律法对性别的建构	251
第二节 十诫的主语	257
第三节 十诫对性态的塑造:不可奸淫	264

一、创造故事中的性态(创 1—3)	265
二、圣经律法对性态的规范	272
第四节 小结	284
结 语	286
附 录	291
参考文献	292
缩写表	324
英汉人名译名表	326
后 记	332

第一章 导 论

尽管,希伯来圣经是古代西亚文明孕育的产物,并作为犹太文化的宗教经典,但是,它却是西方主流宗教的正典(Canon),构成现代西方文明的两大来源之一。毋庸置疑,《圣经》是文化的符号,并在文化中呈现,无论是古代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将文化研究视为圣经研究的内容,已经成为当代圣经研究的重要范式。^①就效果而言,这种研究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并没有设定明晰的时空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跨越。也就是说,无论是促使《圣经》形成的古老文化,抑或现代基督教文化,还是《圣经》之外的其他文化的研究,都能够与圣经研究形成互动。对《圣经》的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圣经》文本本身,及其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建构它在西方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要建构它同其他文化相遇时,与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此,不仅与圣经世界相关的文化研究,对于理解与诠释《圣经》是必要的,而且,

^① 圣经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不仅是《圣经》影响文化,或者文化拥有《圣经》的关系,而且是一个不断的相互再界定的过程。其中,文化不断地再造《圣经》,《圣经》转而不断地推进对文化的影响。圣经研究能够与各种文化的研究发生关联,如此,《圣经》不再在西方文化中享有特权,尽管它传统上被视为其正典。《圣经》的文化研究,将越来越关注《圣经》之外文化研究的历史与实践,并将之视为对圣经研究之挑战的来源,以及一种革新的动力。以文化的视角研究《圣经》,使圣经学者在各种文化成果的场所中,都能发现他/她们自身。参见 J. Cheryl Exum and Stephen D. Moore, "Biblic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in *idem*, *Biblic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the Third Sheffield Colloquium (JSOT Sup, 266;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 pp. 19-45。费尔南多·赛格瓦(Fernando Segovia)是最早将“文化研究”这一术语运用于其研究的圣经学者之一。他对不同文化的阅读,充满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Ibid, p. 34, n. 54。另参见 Fernando F. Segovia and Mary Ann Tolbert eds., *Reading from This Place. I. Social Location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I. Social Location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1995)。

非圣经世界的文化研究,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同样可以与圣经研究发生观照,成为圣经研究之内容。

传统上,当我们论及《圣经》与文化的时候,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圣经》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而鲜少留意《圣经》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其他文化对圣经诠释的贡献或影响。当基督教来到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圣经诠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便即刻发生。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唐代的景教、明清天主教,以及19世纪的基督新教对《圣经》的译述中发现。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尽管,耶稣会士并没有直接翻译《圣经》,但是,他们在引介他们的至上神,并以中文对之命名的时候,或者诠释天主教基本教理的时候,都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十诫作为教理问答文献的重要内容,就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关联,比如,耶稣会士先是以佛教术语译述十诫,在研习儒家文化与同儒生切磋的基础上,他们放弃了这些佛教术语。对话始终属于彼此双方。儒家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到十诫在汉语语境中的诠释。

文化的研究对象,包括对文化客体与文化主体两方面的研究。对文化主体的研究,要涉及对性别的分析,因为,文化与性别是相互交织的存在,二者密不可分。与男女两性相关的性别是由社会所建构,并由文化所决定,是社会文化的深刻总结。性别指涉男女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关系。性别差异构成了文化与社会中最为关键的差异之一,如不探讨性别问题,任何文化观都不算完整。^①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性别差异的共同范式,主要表现为男性主导与女性从属,并渗透在众多的文化形态中。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种不平等的建构范式在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并深刻地塑造了性别差异。但是,性别研究就是要挑战所谓性别差异为自然形成,是由生物学意义所决定的观念,而认为性别意识是后天培育,并由社会与文化所建制的产物。也就是说,性别理论强调社会与文化干预在塑造性别差异中的作

^① 参见 Mary Ryan, "The American Parad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Order",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31-153。

用,摒弃对性别结构之现状的生理决定论的解释。性别作为文化主体呈现的重要方式,深深影响到《圣经》文本的成书,使《圣经》本身无可避免地受到性别价值的限制,而且《圣经》的诠释活动,也同样受到这种限制,因为《圣经》的诠释者,即读者,其所拥有的性别身份,直接影响到对文本的诠释,从而使之成为身份整全的文化主体。而女性主义的理论 with 重构,是文化主体性探讨和对性别结构性分析的双重结果。女性主义圣经诠释重视自我主体意识,批判《圣经》文本及其诠释活动中的性别差异及其与权力之共谋。

如此,文化对性别的塑造使二者成为密不可分的范畴。将之运用于对《圣经》的阅读与诠释,意味着不仅以文化的视角去尝试处理《圣经》文本本身,以及同《圣经》文本相关的文化语境,比如,古代西亚的文化语境,还要处理读者自身的文化语境,使之与圣经研究发生互动,同时,也要批判与揭示《圣经》文本本身及其诠释过程中呈现的性别意识。以上的尝试与努力,其目的在于两点。一是期望能够重构经文的世界与历史,重新认识《圣经》与文化之间发生互动的可能性与潜在性;二是要寻求自我,重新认识自我。前者主要在意于探讨孕育《圣经》的文化语境,以及与《圣经》看似并无关联的读者自身的文化语境,从而呈现文化与《圣经》之间相互的影响与塑造。尽管,这两种文化语境彼此遥不可及,但是它们都曾影响到对《圣经》的诠释;后者是在以读者为中心的基础上,强调读者自身的文化语境与性别身份,使文本经历读者的感受与体验而产生意义,同时,使读者反观自我,培育自我意识。^① 比如,就性别意识而言,十诫是男性为中心之文化所建构的产物。它将女性排除在主流的叙述话语之外,使女性降格,成为边缘化的存

^① 这一点,同利科(Paul Ricoeur)的诠释学观念有相似之处。利科将诠释学界定为:关于与文本的解释相关的理解过程的理论。而文本由五个主题构成,其最后一个主题是作品前面的自我理解,也就是作品开放它的读者,并创造其主观性。他提出三重世界的文本阅读理论,既关注文本的基本结构,也关注读者阅读文本的价值,从而旨在呈现文本丰富而多元的意义。其中,文本前面的世界,是指阅读文本的读者的世界,是文本展开、发现与揭示的世界,其所理解的是文本前面的自我的世界。这不是要把我们有限的理解能力强加给文本的问题,而是将我们自己暴露于文本,并从中得到一个放大的自我,是一个被定为目标的存在。参见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 trans. and introduced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43, 131-144。

在。作为女性,面对将女性边缘化的文本,如何去诠释?因为,这种边缘化的存在状态,不仅属于遥远过去的某个群体,也属于自己,是自己曾经的存在状态。因此,对十诫女性主义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重新认识“主流”文化的过程,更重要的,也是一个深化自我认识的过程。因此,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文化的形式、实践与理论,将引发新的思考。

十诫是圣经律法的核心内容。就十诫的研究而言,基于以上的设想,在结构上,本书将作出如下的安排,去探讨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十诫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进行历史回顾。二是对十诫之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分析,就是关注文本本身,以及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这主要涉及对十诫的文学语境(literary context)与传统历史的考察,展现十诫两个版本(出20;申5)之间的差异及其对具体诫命的划分与解释,以及十诫文本的结构与来源,同时,也涉及十诫同美索不达米亚诸法典、赫特盟约与新亚述盟约的比较,从而寻索十诫的形成与历史传承。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关于具有以西方为中心色彩的“古代近东”一词的用法,本书以“古代西亚”代之,因为,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美索不达米亚、赫特与亚述,而这些实属古代西亚的范畴。三是对读者自身文化语境的分析,即探讨十诫如何与中国多元经典与文化传统发生互动。四是对十诫进行女性主义的阅读,呈现十诫对性别的塑造以及其中的性别意识。本书所参考及引述的《圣经》原文,如非特别注明,均引自中文和合本,并以希伯来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为参照。书中的“基督教”是指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与东正教。此外,关于十诫的划分,本书以基督教更正宗的划分为基础。由于,十诫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它曾经受到多方的关注,从不同的视角被理解与诠释。关于其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诠释的历史,在此首先要作一回顾。

第一节 十诫研究历史的回顾

在20世纪,希伯来圣经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体来讲,这一变化由文学批判转移至以历史批判研究为主流,其中,古代西亚一

系列的考古发现加速了这一转移的发生,及至 20 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批判的兴起。^①就五经研究而言,德国圣经学家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 1844—1918 年)于 19 世纪末提出的“文本假设论”(Documentary Hypothesis),构成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来源批判的经典范例,挑战了传统与保守的既有观念,并对后世的五经学术研究发生了持续性的影响。^②随之,形式批判与传统历史批判^③等应运而生,旨在探究文本的历史传承与演变,

① 这里的“批判”,是指一种批判性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主要针对某一信念、观点或论证,涉及思想中洞察、论断与评鉴的过程,具有建构的目的,而不是一味批驳否定错误的思想或言行。

② 威尔豪森试图探讨以色列宗教的历史与发展,尤其是五经中的律法在以色列宗教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显然,律法是以色列宗教的基础,但事实上,他认为在被掳前时期,人们对律法鲜有所知,而源于那个时期的文献记载所反映的,同其要求并不一致。威尔豪森无法调和五经中律法的传统优先性同被掳前的历史与先知文献中所体现的宗教风俗与制度,提出五经律法可能晚于先知书的大胆假设,而且认为五经中不同的律法并非由摩西在西奈所颁布,而是以色列宗教史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产物。基于希伯来圣经本身内在前后连贯性的缺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 1876—1884 年间,威尔豪森较为系统地探讨五经四个不同来源,即 J(Jahwist)、E(Elohist)、D(Deuteronomist)、P(Priestly),又分别称为耶典、神典、申命典与祭司典。它们形成于单向演进的四个历史阶段,大致对应于约公元前 840 年、前 700 年、前 623 年以及前 500—前 450 年,最后形成的是祭司典(P),属被掳后的作品。威尔豪森指出五经的最终形式是经由以上不同的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编修而成。总之,他充分意识到五经著述过程的复杂性,同时,执著地否认摩西为五经的作者。参见 Julius Wellhausen, *Prolegomena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Pref. by W. Robertson Smith (Gloucester: Peter Smith, 1973), pp. 3-5。此著德文初版于 1878 年。另参见 Ernest Nicholson, *The Pentateuc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Legacy of Julius Wellhaus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 3-28。伴随学术研究的深入,这一理论尽管受到各种质疑, JEDP 之间的历史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但仍具影响力。

③ 在希伯来圣经诠释中,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将《圣经》文本划分为更小的著述单元,在这些起初被运用的不同类型的单元,或文学样式中,力图显示其社会场景。威尔豪森的弟子古克尔(Hermann Gunkel)在其《创世记注》(1901)中,奠定了形式批判的基础。在《创世记》的“简单形式”中,他声称发现了细小的神话、传奇与民间传说的单元,并深信每一个独立的单元,在成为五经来源之前,最初都有其自身的生活场景(Sitz im Leben),从而探讨了五经文本著述形成之前的历史,即口述传统,将威尔豪森的来源推至更宽广的视阈。古克尔的形式批判并不彻底,后遭致批评,因为,很难在叙述的口述形式与著述的最早形式之间作出明晰的分别,而且,将口述传统与民间传说界定于国家产生之前的时期,也是有问题的。但古克尔对五经的形式批判研究,导致了以拉德(Gerhard von Rad)与诺特(Martin Noth)为代表的传统历史方法(tradition-history method)的形成。这种方法解释个别的传统叙述如何最终结合,并成为一个长篇著述之部分。传统历史可以指一种传统的内容经历不同的阶段而得到发展,也可以指其传递的过程。拉德在其代表作《六经的形式批判问题》(1938)中,试图解释为何五经采用了特定的形式,即传统的单元为何不是收在一个随意的集中,而是出现在具有历史次序的文本叙述中。拉德指出“简短的历史信条”(short historical creed, 申 26: 5b-9)是六经的雏形,也是“救赎历史”与扩展耶典来源之历史的基础。同时,拉德意识到历史信条并没有提到西奈与颁布律法的事件,而是出埃及之后直接进入定居之地的征服,因此,律法

尤其是在古代西亚文明的亮光下,五经研究的视阈不断被融合与延伸。历史批判的优越性在于呈现文本本身的历史性,但局限在于无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以及文本的著述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或说价值有效性。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的兴起,质疑历史批判的研究方法对客观真理的宣称,解构文本的绝对性与中心性,指出任何文本都无法脱离文化、经济、政治、阶级、性别与种族等的限制,比如,女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形式之一,重新审视五经著述所蕴含的性别意识,重构文本之历史。

有关十诫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同样经历以上的发展脉络。沿着这一脉络,本书试图对十诫的研究作一历史的回顾与概述。其中,主要通过述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对十诫的关注与研究,说明十诫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本,不同的诠释角度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试图揭示关于十诫不同诠释的历史过程与流变。这些将要述及的学者包括莫文克(Sigmund Olaf Plytt Mowinckel, 1884—1965年)、阿尔特(Albrecht Alt, 1883—1956年)、门德豪尔(G. E. Mendenhall)、斯坦姆(J. J. Stamm, 1910—)、尼尔森(Eduard Nielsen)、菲利普斯(Anthony Phillips, 1936—)、哈瑞尔森(Walter Harrelson, 1919—1988年)与西宛(Hagith Sivan, 1949—)。他/她们的研究方法涉及形式批判、文学批判、传统历史批判与女性主义批判等。20世纪初,对十诫的研究,关注于年代、起源与作者的探讨,尽管威尔豪森等学者已经否认了摩西为五经的作者,并将十诫视为是深受先知伦理教导之影响

传统是独立的,而且,族长的传统也作为新的主题而加在救赎事件的开端。拉德视耶典作者为历史学家。诺特在其《五经传统的历史》(1948)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他指出五经最初是由五个独立的传统组成,这些传统的结合发生在士师与十二支派时期,那时,著述还没有形成。五经的作者是诸传统的记录者与传递者,而每一个传统都有自身复杂的发展过程,比如,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叙述最初各属不同的地区,这些不同的传统后来通过族谱体系的方式相结合。在四经(Tetrateuch)中,诺特认为G(Grundlage)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形成于耶典之前。传统历史方法同样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拉德的“历史信条”被证明属君王制晚期或被掳时期的产物,并不古老;诺特将五经的形成依赖于君王制前的十二支派,但这种观点被认为具有希腊渊源,而且,其各传统之关系的论述具有较强的主观臆测成分。总之,形式批判方法的缺陷,在于将口述传统限定于以色列历史的最初阶段,而实际上,口述传统贯穿以色列史。参见 John Barton, “Form Criticism”, *ABD* Vol. 2, pp. 838—841; 另参见 John van Seters, *The Pentateuch: A Social-Science Commentary*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pp. 41—50。

的后期作品,但是,在1910—1930年间,依然有不少的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一批执著于历史批判的学者,坚称十诫如果不是被掳或后被掳时期的作品,便是后先知时代的作品。^① 双方一直争执不下。但是,这种情形在1927年莫文克发表《论十诫》(*Le Décalogue*)之后,发生了改变,因为他另辟蹊径,不再拘泥于作者身份的探讨,而是将十诫置入古代以色列人礼仪崇拜这一独特的生活场景(*Sitz im Leben*)中去理解。^②

一、莫文克:十诫起源于礼仪

莫文克是挪威宗教史学家、旧约圣经学家与神学家。他一生可谓著作等身,兴趣广泛,涉猎希伯来圣经研究的各大领域。在他57年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著述包括47部著作、185篇论文、151篇书评、5部译著,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作品片断。^③ 实际上,莫文克的卓越之处,并不在于他著述的丰富与多样,而在于“他学术研究中表现的博学、精湛与创造性的

① 坚持十诫的古老性,同认可摩西的作者身份,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关于摩西为十诫的作者,在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的主流,比如,布伯(Martin Buber)与罗利(H. H. Rowley)等毫不犹豫地十诫视为摩西的作品。而坚持历史批判的学者,否认摩西的五经作者身份,比如,斯提尔纳格尔(Carl Steuernagel)、柯尼尔(C. H. Cornill)与梅恩霍德(J. Meinhold)等人。对摩西作者身份的质疑与否定,可追溯至以斯拉(Abraham Ibn Ezra, 1092—1167年)与斯宾诺沙(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年),尤其是斯宾诺沙作为圣经批判研究的前驱者,强调理性地阅读与诠释《圣经》,直截了当地批判启示宗教,指出希伯来圣经本质上是人创造力的产物,也是人编修的产物。五经的内容与语境,都显示摩西不可能著述五经,这对威尔豪森有深远的影响。参见B. de Spinoza,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and a Political Treatie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pp. 120—132。以上代表了两种基本的学术争论,但与之稍有不同的是,葛瑞斯曼(Hugo Gressmann)曾经提出独树一帜的批判,质疑“伦理十诫”(出20;申5)晚于“礼仪十诫”(出34)的形成,否认十诫的古老性与摩西的作者身份,视之为公元前10世纪或前9世纪的作品。参见J. J. Stamm with M. E. Andrew,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Recent Research* (London: SCM Press, 1967), pp. 22—27。此著德文初版于1962年。

② *Sitz im Leben*可以简译为生活场景,是古克尔形式批判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涉产生《圣经》文本的场景,强调二者之间的紧密关联,换言之,没有场景,就没有《圣经》文本。不同的圣经文学体裁,对应不同的场景。比如,《诗篇》场景是圣殿的仪式活动。若抽离了这样的场景,那么,经文的起初意义也随之消失。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itz_im_Leben, 浏览日期:2010年11月10日。

③ 参见Dagfinn Kvale and Dagfinn Rian, “Professor Sigmund Mowinckel: A Bibliography”, *SJOT* 2 (1988), pp. 93—168。

洞察力”。^① 莫文克师从形式批判的创始者古克尔(H. Gunkel, 1862—1932年)。在方法论上,莫文克深受威尔豪森与古克尔这两位大师的影响。^② “他引介古克尔的形式批判方法,并将之同当时受到质疑的文学批判的方法相混合,锲而不舍地坚持一种传统历史批判的方法,就是探究文本中每一个发展的阶段,称之为‘动力的过程’(dynamic process),而不是主要集中于最终形式,不去试图揭示文本的前史。”^③他意识到口述传统的意义,并将这一观念整合进入既有的批判方法之中。他指出,礼仪呈现了宗教的生命观念,宗教在礼仪中发现恰当的表达。他将自己新的研究方法视为是“礼仪历史”与“礼仪功能”的方法,并认为是对他的老师古克尔“形式批判”方法的进一步发展。^④

莫文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礼仪宗教史(cultic-religious history)的研究。他对《诗篇》有独到的分析与诠释,著有6卷本的《诗篇研究》(*Psalmenstudien*, 1921—1924),后改名为《以色列人崇拜仪式中的诗篇》。他探讨《诗篇》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他认为以色列最重要的节期是秋天庆祝的住棚节。这个新年的节期,也是耶和华登基

① Robert K. Gnuse & Douglas A. Knight, “Foreword to the Reprint Edition”, in Sigmund Mowinckel, *The Psalms in Israel's Worship*, vol. 1, Trans. by D. R. Ap-Thoma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2), p. xxi.

② 莫文克认为威尔豪森的研究奠定了对《旧约圣经》历史理解(historical understanding)的基石。他接受威尔豪森将祭司典(P)视为最晚形成之来源的观点,指出:“整个五经的核心部分是由礼仪与仪式律法构成,但这些律法几乎是在相对晚的形式与系统中出现,比如祭司典,它是五经最后形成的来源,是在被掳后著述的。”同时,他也多次提及威尔豪森关于《诗篇》为被掳后作品的论点。在其论及十诫的专著中,有过半的篇幅探讨来源批判。同时,莫文克肯定古克尔开拓性的方法,提供了对《诗篇》新的理解,并奠定了从礼仪的角度解释《诗篇》的基础。他指出古克尔的“形式批判”(formgeschichtliche)与“类型批判”(gattungsgeschichtliche)的方法,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诗篇》在以色列的起源,这可以在公共崇拜礼仪中被发现。而不同类型的《诗篇》,最初与不同的礼仪场景存在着关联。也就是说,古克尔对文本背后各种形式的生活场景之探索,对莫文克具有重要影响。参见 Sigmund Mowinckel, *The Psalms in Israel's Worship*, vol. 1, pp. 13, 35; vol. 2, p. 256; Sigmund Mowinckel, *Le Décalogue*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27)。

③ Robert K. Gnuse & Douglas A. Knight, “Foreword to the Reprint Edition”, p. xxvii. 他没有放弃文学批判的方法,而是将之同形式批判与传统历史分析相混合,从而引致一种完全的历史重构。参见 Magne Soebø, “Sigmund Mowinckel in His Relation to the Literary Critical School”, *SJOT* 2 (1988), p. 35。

④ Ibid, p. 33.